

商业与金融

近世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

Jinshi Yilai De Quyu Jingji Fazhan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建生 主编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业与金融:近世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刘建生主编.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80767-259-3

I.商… II.刘… III.地区经济—经济发展—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F114.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9663号

商业与金融:近世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刘建生

责任编辑: 董利斌

装帧设计: 华胜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发行中心)
0351—4922085(综合办)

E—mail: sxj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太原市钟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530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259-3

定 价: 56.00元

前 言

2007年8月24日~25日,由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主办,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协办的“商业与金融:近世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立揭牌仪式在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辽宁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史学科带头人及相关学术期刊、出版单位5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教育部、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教育厅和山西大学有关领导也出席了此次盛会。

晋商学研究所是山西大学为推进经济史学科发展,整合资源,发挥晋商研究特色和优势而组建的一个校一级研究所。晋商学研究所具有独特的宗旨、目标、固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队伍,并配有严格的学术制度,是山西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要一环。研究所揭牌仪式由山西大学副校长刘维奇教授主持,研究所所长刘建生教授介绍了研究所成立的背景和概况。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和山西大学秦良玉书记分别向大会致辞并为研究所揭牌。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张东刚教授,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正明及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相继表达了对晋商学研究所未来发展所寄予的殷切厚望。

此次会议共收到来自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国学研究院,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太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荫贵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传

统生态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温锐教授等有关科研单位、高校和著名学者的贺信、贺电 15 件。

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君健,原厦门大学常务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对晋商学研究所的成立致以热烈祝贺,并指出,晋商学研究所的成立既是山西大学、山西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一件大事;既是晋商研究达到一定深度的结果,也是晋商进一步深化研究的一个起点和阵地。前辈们殷切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晋商学研究所可以成为众人瞩目的晋商资料库、晋商研究百家争鸣的交流地、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房及高级研究人才的集中地,并相信作为一个新型的、开放的研究基地,晋商学研究所将会和兄弟研究机构一同形成合力,对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新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山西财经大学原党委书记孔祥毅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萧国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贺耀敏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陈争平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方健教授相继表达了对晋商学研究所成立的祝贺,认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的成立是对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推进,是山西学界、晋商研究机构的一个创新和突破。

揭牌仪式后,围绕区域经济发展主题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君健、厦门大学教授郑学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所研究员武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兰兮的主持下进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太新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兰兮研究员,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王玉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贺耀敏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苏少之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刘方健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赵津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许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封越健研究员,山西大学梁四宝副教授、成艳萍副教授、石涛副教授和林柏副教授,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乔南博士等学者先后做主题报告,与会代表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热烈讨论。与此同时,会议前后还收到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研究系、东亚研究学院院长、剑桥大学博士蒂姆·赖特教授,韩国仁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朴燮教授,庆熙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郑日洙研究员,日本立教大学老川庆喜教授等国外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玉茹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的学术讨论不论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还是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来看,都反映了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不断繁荣的局面。

最后,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就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她充分肯定了学术研讨会中论文的质量,认为本次会议体现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已经呈现出几个转折:其一,经济史研究从不被重视到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其二,中国经济史研究逐渐从一般的国民经济史层面向中、微观层面转变;其三,研究视角也逐渐由小变大,由断代向通史发展。这些转变源于社会宏观环境的转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建立到完善,多元化观念的形成,以及中外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渠道的形成等。

本论文集收录了这次会议上国内外学者提交的论文和贺词,同时也收录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部分师生的论文,一同集结出版。编者感谢学界前辈和同仁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感谢山西经济出版社社长赵建廷、责任编辑董利斌为本文集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

刘建生

2009年11月

目 录

前言 刘建生

市场、技术与经济组织

中国工业化 60 年

——路径与建树(1949—2009) 董志凯

中国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大萧条

..... [英]蒂姆·赖特

法制与市场: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周期兴衰的

法制原因 韦 森

厦门 15 种重要商品批发物价指数的编制与辨析

(1929—1935) 刘兰兮

近代中国城市工资水平初探 王玉茹

明治时期日本的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

..... [日]老川庆喜

韩国经济中的政府与同业组合

——以大韩纺织协会为事例 [韩]朴 燮

对 20 世纪 70 年代前期中国工业技术引进的历史再考察

——以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为落脚点

..... 林 柏 李泽平

明清土地产权流转多样化趋势分析

..... 刘清平 郭 峰

货币金融

中国传统商号的原型与演化

——以川帮聚兴诚银行为例 刘方健

银企之间——永利公司融资过程分析

(1917—1937) 赵 津 金 节

清代中国的货币体系 [韩]郑日洙

近代中国商事立法与山西票号的衰亡

..... 王里鹏 刘 俊

浅析典商行会的历史作用 张喜琴 张晓玲

商业与区域经济

永定烟业与土楼 江太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土地买卖和租

佃关系的历史考察 苏少之 张 静

再论清代前期商业利润向商业资本的再投入

..... 封越建

明清时期太原周边市镇的商业地位

..... 梁四宝 郭小鹏

出乎意料的关联:清代山西粮价与灾害
..... 石 涛 李志芳

清代平定州的商业发展
——以盂县藏山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 乔 南

清代山西制铁业述略 刘 阳 席晓军

清代口外屯垦政策与季节性移民
..... 刘亚丽 吴丽娟

地政与城市发展
——以胶州土地法规与税制为例
..... 赵洪玮

1943年武乡农村社会的革命和生产
——太行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之案例研究
..... 李 伟 马国英

知识联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基于中国产业集群演进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 尚利强

西口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浅析
..... 刘成虎 付 宏

垦畦浇晒法与河东盐业
——河东盐池生产的相关研究
..... 张 朋 张姝婷

贸易与税关

清代的归化城税关与西北边疆贸易 许 檀

- 清代的杀虎口税关 吴美凤
- 清代杀虎口实征关税波动的相关分析
..... 丰若非 王志东
- 国际经济学视阈下的晋商茶叶贸易
——基于资源禀赋理论的分析
..... 成艳萍 阎晶
- 清代晋商与徽商茶叶贸易量的估计比较(1755—1895)
..... 张喜琴 李东

晋商与商帮比较研究

- 山西典商与徽典的组织管理比较
..... 刘建生 陈文慧
- 浅析晋徽商的商业实力 燕红忠 马建华
- 晋徽商家族教育内容比较分析 ... 李宇 刘建生
- 晋徽商教育价值观演进分析 刘俊 李宇
- 晋商的财东/掌柜关系及其现代启示 梅建军
- 文化传统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基于历史制度分析视角的新探讨
..... 张华宁 张浩
- 明清晋粤典当业比较研究 任强 李婉婷
- 试论晋商与徽商的职业设计 孔庆新
- 晋商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探析
——以晋中市为例 张海鸥

贺信

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揭牌

贺信

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成立

市场、技术与经济组织

中国工业化 60 年

——路径与建树(1949—2009)^①

董志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年来,政治经济社会经历了诸多变迁与曲折,但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始终不渝;各级规划、计划存在着分歧,但是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65 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了这一奋斗目标,并提出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8 年以来,继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60 年来,我国在十分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工业发展速度总体位居世界前列。一般认为,中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于 1991 年基本跨过第一个转折点,即由工业化的前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②;

*董志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是 2009 年 7 月董志凯先生在武汉会议上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年周年的发言,已被《中国经济史研究》采用,应刘建生先生的再三约稿请求,董先生同意将此篇文章收在该论文集。

②工业化按期发展水平和程度分为工业化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提出了划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工业就业人数占工农业就业人数的比例、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和人均 GDP 等项指标。标志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的指标是:工业产值比重大于 60%,工业就业比重在于 45%,城市人口比重大于 35%,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以上。标志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的指标是:工业产值比重大于 60%,工业就业比重大于 70%,城市人口比重大于 50%,人均 GDP 达到 2000 美元以上。从 1991 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上述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水平。2008 年我国人均 GDP 首次突破 3000 美元,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即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今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会加快,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也将发生重大转变。(参见《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陈佳贵:《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载《中国宏观经济信息》2009 年第 10 期)。

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化阶段。^①

回顾 60 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从本国国情出发,走了一条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一、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视基础设施建设

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际,战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即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这一选择首先来自一百年来中国追求近代化、现代化的足迹。

19 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中国于 19 世纪后半期创建新式工业。当时,西方拼命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如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机”主要指兵器,“船”主要指战船,“矿”主要指煤矿,“路”指铁路。为了制造“机”、“船”,修筑铁路,钢铁的生产也突出出来。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都是追赶时代的。然而,它们是一些投资高昂的产业,其中除了铁路以外,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项目。因此外国资本不肯在中国设置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等厂矿;中国的私人资本则功力不足;官办企业又管理混乱,风气腐败,不能正常生产。及至 20 世纪初叶,“机船矿路”建设归于失败。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本土战乱不断。虽有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但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近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 17%^②。工厂规模很小,纺织和饮食、烟草业的产值占了工业产值的 58.4%,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重工业)产值比重很低,1933 年仅占工业产值的 23%左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工业受到摧残,战争对重工业的破坏比轻工业和农业更为严重。1949 年重工业产值约比战前降低 70%^③,明显成为“比较

^①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工业化蓝皮书》认为:大约在 21 世纪 40 年代前后,我国将实现工业现代化。(见 2009 年 3 月 3 日《中国经济时报》)

^②《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 63 页。

^③郭瑞楚:《恢复时期的国民经济》,三联书店 1953 年版,第 60 页。

劣势”。国民党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开办了一些兵器制造、修理厂，规模和技术水平有限。成渝铁路则自清末筹建至国民党时代终结近 50 年没有建成。

由于基础工业和设施对于现代化十分要紧，而发展起来又屡遭挫折，以至无数志士奋斗不息，矢志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攻克这一难题。代表人物如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立志修 5 万公里铁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等决心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并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运航空。在这个曾经起过“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性文件中，把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奋斗目标，把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建设重点。这与近百年前的“机船矿路”追求何其相似！这种选择来自对国情和对中国工业化途径的一种共识，其中有继承也有发展。

对于历史的延续或继承，我国学术界在很长时间注重不足。50 年代学习和宣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时，学术界在论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积极的工业化方针”中，曾用斯大林的一些片面观点解释我国的经济方针，归结为“只有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等^①。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有学者把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笼统归咎于“照搬苏联模式”，以至把一些本来在当时具有客观趋势的作法也斥之“照搬”而加以否定了。事实上，一个国家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而要适应它所处时代环境，走自己的道路。我国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是由于这一方针基本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①参见李学曾：《历史的思考和思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由于兴建这些基础工业投资多、周期长、资金回流慢,建设起来困难重重。外国资本不肯建,中国私人资本建不起。1952年,中国内地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按1952年底总人口数5.7亿计算,人均仅119元,按当时的比价,约合30多美元^①。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单户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后很少剩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资金也很分散,在私营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市,工业企业1950年户均流动资产10.7万元;商业企业户均自有资金2.38万元^②。要建设平均投资约5000万元以上的重工业企业,私人财力可谓杯水车薪。在物资与技术力量匮乏的背景下,国际环境又相当恶劣。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政府即宣布“美国不应给共产党中国以官方的经济援助,也不应鼓励私人在共产党中国投资”。^③并将中国列入了“巴统”管制的国家之中。^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进一步全面升级对华经济封锁。

面对国内外巨大压力,中国选择了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选择得以实施,一方面由于40年代末民国垄断资本高度集中,^⑤以战前法币计算,战后国民党官营资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资产额508118万元,^⑥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3.85%。^⑦1949年以后,以这些企业为主体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中外经济关系的上述背景使中国的外贸方向从西方迅速转向苏联、东欧。在通过“以货易货”方式大规模引进资金、技术的同时,也

①GDP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局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9)》,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人口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②《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8页。

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印:《战后国际关系史料》第一辑,第75页、100页、114页。

④详见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

⑤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前是它的崛起和初步发展时期;1937~1945年是快速发展时期;战后至1947年因接收日本和汉奸政权的产业而急剧膨胀。

⑥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发展的概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⑦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731页。

学习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20世纪50~8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有从以下特点：

(一)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优先发展重工业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至1952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受能源、钢铁、机械、化学等基础工业制约,已有的轻工企业设备不能充分运转。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防工业的需求。为了不再重演国家和民族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借鉴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成功经验,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中,进一步明确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国际环境制约,建设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内部积累,为了集中物力、财力、人力实施这一方针,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一化三改”方针,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建设与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针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在工业化建设中,把工业基本建设放在首位,同时充分发挥已有工业企业的潜力;重点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运输及其他行业;重点建设内地工业,同时注意发展沿海工业;重点建设大型工业,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工业;将工业高速增长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兼顾;重视引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设备、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

二是通过农业互助合作,解决土地改革后部分农户生产资料不足,劳力、资金短缺的困难,采取互助合作办法,在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有限提高、城乡社会稳定的同时实现以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为主的工业化早期的工农、城乡关系;采取合作化的办法,改造与发展个体手工业;实行赎买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6年基本实现公私合营。通过“三大改造”,政府以低成本获取农产品与劳动力实现了初期积累,解决工业化最困难的资本匮乏问题,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保证了工业化方针的实施。

中国的计划经济既学习了苏联东、欧等国经验,也有其特殊性:计划没有苏联完善,也没有那样僵化和刚性。从一开始就针对不同对象提出了指令性计划、指导

性计划和参考性计划；即使在计划体制内也有 20%~30%的缺口，要由企业通过市场自筹；对于地方政府和农村，计划指令远远不能覆盖^①。

(二)以政治激励为主，建设规模和速度与国力平衡困难，变动曲折、波动大

中国工业化初期，政府投资与国有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主观计划的建设规模和速度如何适应客观国力发展水平，数十年中经历了反复实践和曲折探索，导致经济大幅度波动。

面对需求巨大而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矛盾，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反复出现考虑需求多，研究可能不足的急躁冒进倾向。1953年和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两次“冒进”后，陈云于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薄一波将其具体化为“二、三、四比例”思想，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②。

1956年反对急躁冒进，使1957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导致1958~60年工业生产建设搞“大跃进”。不切实际地追求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片面强调大炼钢铁。这不仅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且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虽然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工业项目，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一倍以上，但是难以为继。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部分地区发生严重饥荒。1961年起调整各项计划指标，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关停并转部分工业企业，加强设备维修和生产能力配套，积极引进新技术，到1965年工业生产能力恢复，当年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达

^①参见向新、苏少之：《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经济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经过了从苏联政治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的转变，但在实际操作上，始终没有脱离自己的独立轨道。毛泽东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打破了斯大林晚年的僵化模式。孙冶方的“计划价值规律”，第一次试图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陈云提出“鸟笼经济”概念，坚持四大平衡。对于中国和转轨国家而言，其意义不下于凯恩斯之于西方经济。

^②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1040 亿元,比 1957 年增长了 2 倍。石油、化工和电子、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

1965 年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确定“三线”建设为战略重点,要求各协作区自成体系。“三线”建设投资接近或超过同期工业建设总投资的 1/2,许多沿海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迁往“三线”。至 1970 年又重复了高指标、瞎指挥的作法。1973 年借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机,改变备战优先的方针,在三、五年内引进了 51.4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重点解决吃穿用、支农和基础工业的问题,引进的 70 多个项目大部分取得成功。但受“文革”影响,1966~76 年间 3 年经济负增长,工业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下滑。1976 年“文革”宣布结束,放手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装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

(三)企业生机与活力不足的问题愈益凸现

1953~1991 年,我国渡过了工业化前期阶段,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共计用了 38 年。同一历程美国约走了 80 年,日本约走了 40 年。情况表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起了正面作用。^①在计划经济时期,面对在短短几年内形成的大批从无到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面对数百万迅速从部队、农村转到工业企业的新职工,强化计划性,加强基础工作、严格规章制度、提倡职工大练基本功等工作是有成效的。

但是随着企业的大批投产与发展,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宏观计划多变、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的粗放经营模式,企业被管得很死、没有自我更新改造能力等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症结越来越凸现出来。作为经济细胞的工业及各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也曾调整和改变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曾数次扩大地方的权利,却忽视了企业自主权;曾数次过多过急地下放权限,却缺乏有效的宏观控制,在激化了

^①参见姚洋、郑东雅:《外部性与重工业优先发展》,载《南开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姚洋、郑东雅:《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载《经济研究》2008 年第 4 期。